



代际权利与责任语境下的青年展望:

来自非洲的启示

John Aron Grayzel

摘要: 本文从追溯不同时代青年的定义出发,对青年运动、青年领袖等概念进行了探讨,并以在非洲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对代际社会和青年的权利责任行为进行了分析,希望以更包容的态度对青年的角色进行界定,思考适合21世纪秩序的代际关系、权利和责任。

关键词: 青年; 青年领袖; 代际关系; 角色

今天我们聚在一起都是为了一个共同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从某些方面研究和提升青年转换为有效的领导人。在美国,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也拥有数量庞大致力于推进青年领导力的著名组织,两个突出的例子是少年成就会(Junior Achievement(JA))和国际青年基金会(International Youth Foundation(IYF))。这两个组织我都同他们工作过,并目睹了他们在美国以及海外取得的成功。另一个感兴趣的青年领导力组织是“休·奥布莱恩青年领导力组织”(Hugh O'Brian Youth Leadership(HOBY))。这三个组织提供的例子都是灵感和改革创新的结果。还有一个更乡村化的美国4-H俱乐部,属于受到了少年成就会和国际青年基金会改革并走向全球化启示的例子。休·奥布莱恩青年领导力组织是在1958年由休·奥布莱恩在非洲赤道附近那间著名的医院里会见艾伯特·施韦策博士以后建立的。

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受到下面这种情况的驱动:世界范围内的青年领导力组织及其成员的成功与未发挥潜能、经常被严重疏远的青年这一更普遍的社会状况形成了巨大反差。至少在美国,这种疏远伴随

着社会各层次对于领导力的广泛的失望和指责。而更普遍的现象——代际间领导力的失败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

这一现象所涉及的人群,包括青年人和老年人,他们往往不认为自己有责任行使领导力,而不管其地位如何。另一方面也包括不参加那些特殊的青年领导力训练计划的青年人的经验,也包括大多数人所体验到的代际关系和责任的本质。除非这一现象得到应对,否则现有的关于青年领导力的努力,不足以催生我们现在所急需的全球性变革。

一、澄清基本概念

今天的青年面临的情况不能孤立地去处理,因为应对全球化和地域社会的变迁,既需要重大的制度创新,又需要代际关系的不可或缺的重构。青年是这种变革的重要动力,青年组织和领导力正是年轻人活跃和绽放魅力的明显方式。但不幸的是,大多数经典的青年运动不适应21世纪的现实情况。与那些出生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青年相关的许多流行的概念或定义,诸如工业化,科学和技术,以及以个体



为目标的心理学，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全球化，以及充满新出现的社会和人口现实的时代面前，也显得苍白无力。

“青年”这个词非常古老，但是直到19世纪晚期，大多数人，即使他们受过教育，12岁离开学校，也不过作为童工在农场或者商店工作，大多在十多岁就结婚并生育孩子。这个概念的“青年”，在这一背景下，变得短而且突出——这正是今日青年文化的呐喊。“青年领袖”作为一个概念，已经被看作是一种矛盾。亚历山大大帝在16岁开始摄政，20岁当上国王，并在21岁时开始了他的征服生涯；圣女贞德在13岁时受到召唤，17岁时她带领法国军队打败了英格兰，19岁时被烧死在木桩上；拉法叶侯爵14岁时参军，16岁时结婚，在19岁时被美国大陆军队委任为将军。所有这些人都不被同代人视为“青年领袖”或者是“青年领导力”的典范。但所有这些人都是跨越世代的“领导人”。然而，在19世纪晚期，发生了改变，“青年”被重新界定为一个短时期的生活状态。

同样的，青年运动，就像“青年”这个术语本身，也难以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如果我们从一个功能性的角度来看西方青年运动，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反映出以下三种模式：

1. 老一代总是想改造青年一代成为其喜爱的那类人。

2. 年轻一代总是试图把老一代创造的社会改变成其他面目。

3. 年轻一代总是试图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这个世界，或者有的时候，也在这个过程中改变老一代。

在所有的情形之中，共同的因素是渴望实现这种转变。在第一项和第二项中，在代际之间权力的投射上存在着潜在的方向性。每一代人都认为他们自己是“正确”的，并且会影响其他代际，使之变得更好。乍看起来，我们能够找到无数的例子——从建立儿童军，再到建立纳粹青年运动（没有暗示他们在道德上是等同的），凡是成年人创造出来塑造青年的组织都相应的是为了达到社会成年人所希望达到的目标。相反的，如果我们从青年发起的运动看——比如1968年在德国 Baader-Meinhof 寻求起义而建立了骨肉精神联系的团伙；在美国我们看到的例子是青年一代为了反抗上一代的行为模式而要求彻底的

变革。

至于第三种情况，青年人改变他们自己，像美国的嬉皮士运动，所传达出来的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另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民权运动，青年组织呼吁国会实行种族平等，在美国南部实行了著名的体现种族平等的自由巴士乘车制度。

上述这些群体都可以称作“青年领袖”，每一个组织的领袖并不需要别的组织成员承认他们是“领袖”。举个例子，青年领袖在那些激进的团体里也许被视为“被操纵的傀儡”，这些领袖们也可能被团体成员视作“被财富宠坏了的孩子”，这些领导人也可能被社会上有声誉的青年团体视作“不适应社会的人”。结果就是：所有这些“青年领袖”没有一个能被视为是广泛的社会变迁的负责任的推动者。相反的，他们被其他青年视为推动了特定的现存亚文化的伦理和目标的延续。

在现有的情况下，青年很难成为真正的领袖。在西方模式里占主导地位的“青年”是指一段相当长的青春期。这一模式是由旷日持久的教育和稀缺的青年就业机会决定的。这个过程的发展性质与其说为什么在美国，没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标准可以用来定义“青年”，而毋宁说，这个概念视不同目的而被重组应用于整个生命周期。在美国，21岁是一个普遍获得饮酒权利的成熟年龄；16到18岁可以无需父母同意而结婚；18岁可以获得驾照；还有，16岁可以无需父母同意而人工流产。同时，在非公务界，13到15岁也是在某些年长的青年结成的组织中获得成员资格的起始年龄。像其他的一些组织，比如各种低级的联合会（例如，一个初级商会），年龄要求就有所不同，从十几岁到三十岁。可以概括的说，在大多数情况下，“青年”属于一种高度的流体状态，可以延伸到个人的第三个十年，标志着有一些“较小”的能力、责任，或独立的权利。这一点与真正的领导能力明显矛盾，更不用说其他的了。

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当今西方的流行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西方青年运动都是基于青年只能承担有限责任的设想。从这一点来说，最典型的西方青年运动都是在成年人指导之下并带有强烈的家长制作风的。成年人总是觉得直接介入青年的社会运动义不容辞，这种运动在美国的官方组织里仍然强烈的存在着。而就非官方组织而言，至少从19世纪

60年代以来，由青年自身发起的运动有所增加——小团体、小帮派、朋克摇滚等等。这些群体最显著的特点是青年对社会的疏离感和青年人对老年人的有意识排斥。

但是我们需要问的是：到底是谁排斥谁？在富裕的北维吉尼亚郊区的莱斯顿，对青少年的研究事实似乎说明，青少年一代对上一代的疏离感体现在行动上，因为富裕的家长几乎没有时间与子女进行互动，并监督他们（Hersch, 1999）。正是这些工作消耗使家长们忽视了自己的孩子，从而让孩子对父母产生抵触情绪。在莱斯顿，成年人在行为上疏远孩子，并且拒绝把孩子和广阔的社会联系起来的责任，而正是社会对子女不同团体的归属感和行为规范的形成发挥了核心作用。

目前需要代之以一个更结构化、更有包容性，但又具有弹性的对青年的界定。不过，这项工作并不容易。我们在21世纪面对的现实是，没有任何人，不管是青年还是老年人，都不清楚人类的未来是什么。由于科技的高速进步和社会的变革，我们所有人都在向一个未知的世界前进。这种情况跟以往人类的境况差别强烈，在以往的岁月里，有足够的恒定性允许成年人认真设计关于青年的经验，来指导青年扮演已知或能合理想象的未来角色。同时，它允许过渡性的社会调整，在这种情况下，青年抓住新出现的进化问题，并改变那些甚至可以主导成人的行为（像在美国的公民权利）。

但是今天，扑朔迷离的政策和做法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其结果是两代人之间的不断隔离，因为每一个似乎迷失的轨迹都在不断地变化。与此同时，社会的所有成员，尤其是青年，被利益控制和操纵，从相对良性的商业营销到真正危险的恐怖组织。他们在瞄准机会，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条件，而不是对普遍存在的问题推进健康、变革性的解决方式。对这些状况的简单化、僵化、组织性的反应不会纠正这些弊端，因为成年人在经历生活变化的过程中也在迷失自己。事实上，越来越多的青年对社会革新拥有了新的能力和权力。但对于明智使用这种能力和权力，他们还缺乏必要的准备。

然而，在这个新的全球性结构转型时期，重新界定和调整“青年”角色的方式依然存在。我们需要发展新的认识和做法，把经历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所有年龄段个体的经验系统地结合在一起。全球人口统计

学正在把世界切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前者，“青年”群体日益主导其国家的社会动力，后者，老年对青年日益增加的比率可能会造成利益和责任上的严重的代际冲突。这两种情况，都使得代际关系的本质成为讨论青年问题的话题。

二、非洲社区的实践

我相信，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代际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代人既向他人学习又相应地引导其他人。我们要结束延长青春期的政策，并建立清晰的对权利和责任关系的关心，因为这种关系存在于人生各个阶段。在这种新的代际关系背景下，任何人都既是领导者也是追随者。

在这方面，非洲虽然经常被认为是积极现代化的最差的实践者，但它却可能会提供很多的见解。尽管西方似乎是个体革新的主流之地，东方更侧重于受训练的群体运动，但传统的非洲社区却尤其强调代际成熟的持续过程。鉴于非洲是一个存在着巨大变化的大陆，所以以下的讨论并不适用于所有的非洲社会。然而，关于“青年”的显而易见的模式和持续的定义却可以洞悉许多非洲社会。

以下对于“青年”的分析主要是基于我在非洲马里同富拉尼族和班巴拉文人一起生活的个人经验，在那里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与Lega一起，结合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过程中获得的知识，直接开展了田野调查。

作为背景，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富拉尼人是一个游牧民族，个人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单位。而班巴拉文人是一个农业民族，对他们来说，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而社区协作是主要的社会单位。Lega是一个农业——狩猎——渔业民族，在那里个人和较大的协会生活之间处于动态的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于家庭和社区，并认为是从家庭到团体这些所有单位的基础。

现在描写一下我们生活在富拉尼时，我妻子（Grayzel, M. 1974）所做的以下观察。

一个十几岁的盲人少女，走路时头上顶着一个金属的碗，不停的叫卖着她的东西。前面引导她的是一个小男孩，虽然最多只有四、五岁的样子，但他已经承担了成年人的责任。

也许这个孩子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但是



毫无疑问的是，根据西方社会的假设，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是不能完成重大的社会责任的，而且必须处于成年人的不断的监管和保护之下。

当然，富拉尼、班巴拉文，以及 Lega 这三个群体的文化，明显的涉及到他们的经济生产系统的性质。富拉尼是一个实行个人所有制的游牧民族，他们的所有生产活动都围绕家庭这个核心展开。在这里，压力已经使一个 12 岁的个体开始承担责任。在 12 岁的时候，孩子已经要准备放牧整个家庭赖以生存的牲畜了。我们可以看到，向一个孩子灌输责任感和开发他的能力，使之成为一个引导者和保护者的效果是很明显的。

班巴拉文人的情况却有明显的不同。他们是一个依赖农业的民族，由于他们生活的地区有偶然且高度聚集的雨水，这也就决定了其生产系统需要人民协作准备和收割农作物，并且在粮食落地前迅速收割。因此对于班巴拉文人来说，团体和协作极其重要，同时也相应影响了他们对待青年以及青年自身的态度。

班巴拉文有一个叫做 ton 的组织，用于组织他们的劳动力资源。这个组织主要由青年人组成，其中包括十几岁的青年人，这也只是个人在其生命中作为团体成员的一个阶段而已。儿童经历这个过程大约持续 3 年时间。因为儿童的不断进步，这个团体永远也不会改变。这个群体的成员根据其出生时的重要事件而获得群体名称。他们的团体认同也根据其共同经历的各种仪式而不断得到强化。因此，在班巴拉文族中，“青年”是一段团体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的身份将保持一生。这种模式与大多数西方模式有很大不同，在西方，青年运动代表着一个人特殊时刻的集合，然后每个人都会带着那段经历相继离开，继续他们自己新的人生。由 ton 组织的班巴拉人一年一度的仪式，强化了个体在群体中与他人的关系，在这个仪式中青年通常嘲笑他们与老一代的关系，而老年人则会边看边笑。通过嘲笑老年人，青年人会将自已同老年人对比，而最后大家则会意识到对彼此的依赖。

至于 Lega，他们更多的是注重在刚果东部水源充足的地区个人的农业生产、狩猎和捕鱼，其中联系个人和代际之间关系的是一个叫做 Bwami 的秘密仪式。这个 Bwami 由精心制作的仪式、艺术、舞蹈、故事、指导组成。在开始的每一步中，每一个成员

都会被一个更高级别的会员（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引导，每个人的进步都视个体的准备情况而定。这种教学主要侧重于道德以及每个人对道德生活的期望。虽然年龄和等级有一定联系，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有的人仍停留在生命的较低阶段，有的人呈现快速的上升趋势，有的甚至选择从不参加。最重要的是，需要了解每个阶段的启动都意味着承认个人的实际的能力，并将道德责任和自我身份以及个体的准备相匹配。

从西方的角度来看，在非洲的秘密社团，老一代人指导和引导着新一代人。相比之下，从非洲传统的角度看，被选出的成年人拥有着超自然的力量，正是他们提供着这种指导。给予这些指导的人代表了这些力量，而且通常他们认为在艺术、舞蹈、秘密社团的仪式中，精神确实存在于这些过程和出现的变化中，并制定标准让所有代际的人都遵守。

富拉尼族的制度不同于那种相当发达、课程也很规范、有非常专业的指导、有特别开发的材料以及非常标准化考试的制度。在那里，都是父母教导孩子正确的做法。对于富拉尼族人，如果孩子还小，则主要是母亲教育孩子，而当一个男孩长大成人，父亲越来越多的负责他的道德教育。长大的女孩会与母亲分享家务事，她们谈很多，并变得很亲密，母亲会告诉自己的女儿在结婚前的性生活习惯及如何跟自己的丈夫相处。同样地，一个父亲也会与自己的儿子谈论这些相关内容。然而，在对这些秘密社团的系统进行研究以后，像 Lega 的 Bwami，简单的把他们定性为非正常的教育似乎并不公平，至少他们应该被视为是正规和非正规相结合的混合教育。更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识别更高权力既是教育的手段也是教育的目的。

刚果的“大学生万人代表”的经验证明了：在非洲，通过教育获取权力的程度影响了代际间的领导关系。这对于非洲的近代史是一段非比寻常的经历。当时刚果刚刚从比利时手中获得独立时，这个国家连十个大学生都不到，而且，他们大多毕业于神学专业。后来蒙博托上校呼吁在欧洲的大学生返回刚果。他在健康、财政和农业等一系列不同领域设立了委员会以协助管理国家。这种想法主要是培养“学生/技术员”和建立一个技术专家型的政府。这个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Burg, 1998）。但事实上这一构思也证明了非洲的一种独特的态度，即政府的责任可以在各代人之间



间分享。

三、社会变革与代际传承

一般来说，西方青年运动可以被视为分离世代的一种手段，因此并不是促进社会变革的代际媒介。然而，在规则之外还存在例外，这个特例对于在学术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尤其接近他们的内心想法。

大学一直是研究西方文明最持久的基地之一。这些有强大影响力的大学是如何出现的？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给了我们一些答案。博洛尼亚大学是1158年由当时的皇帝弗雷德里克巴巴罗萨宣布承认的，一开始，学生叫它“联合组织”，此后为了得到当地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优惠出现了“大学”这种称呼。同学们不仅对从当地服务提供者（比如说房屋所有者、老酒馆等）那里获得廉价商品感兴趣，而且对自己给老师提供一些建议也感兴趣。学生在这种非常自由和无拘束的空间里开展着相关活动，而老师们为了回应学生，创立了名为“大学”的协会（Burg, 1998, p29）。而在巴黎，相反的情况发生了。在1200年，为了应对学生们的动乱，专家们第一个组织了大学（Burg, 1998, p159）。在这两个例子当中，很显然的是青年出于自己的兴趣组成了团体，同样，年长的人也因为自己的利益组织到了一起，两组人需要共同协商出持久的妥协办法。当局者意识到了两者的这一需要，结果便创建了共享的社区“大学”。可以说，“大学”能持续到今天，是基于学生、院系和行政当局动态的平衡。

在现代西方社会是否有这样的例子，这些例子证明了代际协作在社会变革方面，在分享个人和人生知识和领导力方面具有相似的可能性？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几代人为了美好的前景保持信心和为了建构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他人做出特有的贡献。我认为我们有这样的例子，而且我认为维持这种关系的一个秘密就是所有团体通常都会对更大的权力和目标心怀感激。当较高的目标和权力具有共同的信仰时，区别于西方经典的青年组织的代际间的动态协作便成为了可能。这两个例子尽管受到自然条件的局限，但也意味着这有趣的例子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在美国，我们可以在宗教教育中发现很多代际之间学习的范例。一个例子就是圣经学习小组，年轻人和成年人可以在里面一起学习。这些小组主要发生在新教徒当中。因为年龄越大并不意味着对圣经知识掌握的越深刻，因此年长者和年轻者一起学习相同程度的圣经并不是不符合逻辑的。另外一个例子来自于巴哈教徒的宗教信仰，这种宗教信仰通过一个叫做“RUHI”研究会，形成了代际间的精神学习机制。不管每个人是老还是年轻，最后都会为他们自己的理解负责。这种代际之间的学习过程确实是通过个人的努力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被看作一方一直试图把自己的理论强加给另一方的关系。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每个团体都与他们屈从的更高或外界权力形成了一种关系。

有没有其他的从非宗教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代际学习的可能性呢？在美国，特别是涉及到当地事务的环保运动（例如一个当地景点受到毁坏时，或者建立一个受保护的区域，或者游说使一个政策发生改变）往往吸引几代人的关注。这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环境现实的适应。《我们共同的旅行》（国家科学协会，1999）认为，现在我们确实没有一个持续发展的模式。虽然对此有很多的见解和关注，但是事实上这些模式并没有得到证实。这种现实直接反应了今天所有人共同承担未知的未来。作为结果，我们在通往未来的旅程中需要实验、创新、公正的裁决、实践和智慧。由此得出结论，要想使此次旅程获得成功，我们需要开发这样一种处理方案，这个方案对于所有年龄层次的人都是开放的。

因为全球环境问题面临挑战，要求社会转型，这种转型能够使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人类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创建新的代际学习范式的绝佳机会；可持续发展使我们认清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生活；这些都主要受到非洲 *lega* 的启发。这种理解使我们认识到人生的任何阶段都有独一无二的力量，在社会发展的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力量。

在发现新的代际理解的这一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将是对现有定义和理解的复习，这种定义和理解是与过去和原来的目标关联的。考虑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和寿命不断延长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产生不同代际之间多方面关系的混合物，我们需要看到使人更加强大的观点，而不是通过强调能力和相互的责任



去限制人们。

“童年”可以被定义成好奇、玩耍、需要成年人保护的年代。一个小孩应有的责任似乎是更乖一些，而“青少年”则被定义成充满实验，同龄人沟通和成年人普遍指导的年代。青少年的责任可能是慎重和共享。“青年人”可能被定义为这样一段时期，在这个时期压力使关于方向和目标的选择与认真、有目标性的方向相一致。青年人的责任可能是为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成年人”可以被定义成对自己和他人具有较大责任，有和更加有经验的人进行交流的需要的一段时期。“年长者”可以被描述成消化知识和经验，以及提高熟练性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拥有运用智慧与他人或者其他目标和谐相处的责任。“老年人”可以被描述成精神相对平静的一段时期，在这个时期有从更加有活力的人那里获得知识的需要。

所有上面这些都是“精神的实验”，不是已经发展好的案例，但是为了新的代际学习过程，为了重新思考代际的目的和定位，我们开始针对现实的需要寻求对策。这必须按照某种方式展开，这种方式使各个阶段的各种不同能力完全按照人类需要和更高的共同目的进行排列。经验一再证明人类的实践和能力远不同于被主流机构、观点和兴趣所认可的内容。如果我们想快速发现人类影响代际转型的所有能力，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快的获得所有的观点和经验。不幸的是，上一个世纪以来，我们通过不断增强的依赖和需要取得了扩张，但这些扩张已经演变成鼓励有限责任的观点，而不是开发最大的能力。人们同时过多的提倡个人利己主义观点，而不是群体和社会认同；同时强调代际间的断裂性，而不是鼓励代际间的传承关系。

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可以垄断这种答案和解决方法，所有可

行的见解和经验都必须在一个新的代际社会中出现。在开始这种努力时，我们需要重新界定“青年”以及其他的人生阶段，并强调识别每个个体能力的类型和理解。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向各个年龄段的人提供各种好的机会，并利用他们的能力来满足自己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发展的时机已经来到了，发展不是一个直线、条块分割的过程，而是一个综合两代人共同努力的过程。

一粒种子可以长成大树，而一棵成熟的植物是由根、茎、叶、花及种子组成的。当还是一粒种子的时候，这个植物就存在了。不同的是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表现，而不是绝对的存在与否。对人类而言，生命过程是一个多重能力渐进式展开的过程——身体的以及精神的——正如 Lega Bwami 在不同情形所体现的精神文明。我们应该在现实情况中理解青年，理解他们作为个体所扮演的角色，在领导实践中作为团体所发挥的作用。

我认为，就目前而言，对于我们这些对青年和青年领导力感兴趣的人来说是一个好的时机，因为跨文化和全球伙伴关系的推动者开始重点关注更好地开发和形成代际理解和合作。这种伙伴关系应该是代际间的。它的目的是要重新思考和重新界定常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轨迹，重新思考和界定适合 21 世纪秩序的代际关系、权利和责任。

时机已到，人类不能再依赖于任何一个领导、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或任何一代人，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所有的领导人、民族、文化和几代人身上。

John Aron Grayzel: 美国马里兰大学

翻译: 朱国栋、杨桂萍

责任编辑 / 方奕

参考文献:

- [1] Burg, David. Encyclopedia of Student and Youth Movements New York: Factson File, 1998.
- [2] Grayzel, Mary. "Field Notes of Fdimbougware, Mai, 1974." Unpublished journal.
- [3] Hersch, Patricia A Tribe Apart: A Journey into the Heart of American Adolescence.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9.
- [4]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ur Common Journey: A Transition Toward Sustainabilit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9.